

1811



吕振羽(1900—1980)

邵阳文史

第 2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邵阳文史

第 2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〇年八月

主 编:王梅初
副 主 编:谢道锡 樊家信
责任编辑:刘 璞

邵阳文史

第 28 辑

邵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编

*

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精品彩印厂印刷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3 万字

印数 1-2000 册

湘邵新出准字(2000)第 15 号



△邵阳市政协学习文史工作会议于2000年10月12日-13日在邵阳市召开，各县、区、市政协主席或副主席及学习文史委主任出席会议。



△市政协主席李竟成致辞。



△省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田伏隆作指示



△会场一角。



△会场全景。



△市政协副主席严农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

杨期林总结发言。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

王梅初作工作报告。



△市政协秘书长曾光春、市文联
副主席樊家信等在主席台上。



△李竟成主席等在主席台上。

目 录

人物春秋

筚路蓝缕探道崎 立学传世志弥坚

- | | | |
|--------------------|---------|-------|
| ——纪念吕振羽同志诞辰 100 周年 | 桂遵义 | (1) |
| 孙中山与袁也烈 | 何锦洲 | (9) |
| 贺绿汀兄弟的共同特点 | 曾永有 | (13) |
| 贺绿汀关心音乐教育 | 王铁伦 | (18) |
| 廖初江生平述略 | 廖水树 | (23) |
| 访刘齐贤教授 | 马长兴 | (32) |
| 记容众四五事 | 王振奇 | (41) |
| 风雨人生路 | 谢道锡 | (50) |
| 一个海里凡的人生之路 | 苏 璐 | (68) |
| 我的父亲谢茂哉 | 谢偶生 | (78) |
| 英勇抗日的何平将军 | 何众孚 何众勇 | (84) |
| 为了邵阳电气事业 | 吴兴智 吴兴勇 | (94) |
| 名医何致潇事略 | 苏缙如 | (103) |
| 名医李台春 | 刘建材 | (113) |
| 无籽西瓜专家陈为霖 | 肖新业 | (115) |
| 岳飞后裔在邵阳 | 岳米乡 岳志勇 | (119) |
| 蔡锷将军惩治恶霸 | 邓锦心等 | (127) |

政协工作

- 邵阳市政协提案工作 50 年 陈代义 (129)

往事钩沉

- 在甘南剿匪的日子里 曾德恒 (137)
五十年代对资改造中的工会活动 孙纯贵 (141)
武冈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变革的回顾 杨章健 (154)
粮食统购统销的回眸 郑治凡 (171)
忆高崇山公社整风整社 刘岭岚 (176)
过“苦日子”的点滴回忆 肖克球 (183)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作战五十周年

- 五月的鲜花红彤彤 钱岳鸣 (194)
远去的烽烟 朱刚强 (209)

教育卫生

- 八十年代邵阳市区社会办学 容 众 (229)
回忆洞庭中学 蒋涤非 (248)
回忆 1958 年的武冈师范 许新民 (264)

洞口县建立麻疯村始末 邓 华 (277)

交通史话

库区航道纪实 杨来凤 (283)

海外见闻

旅美见闻 刘揆民 (290)

马来半岛纪事 谢凯南 (299)

文物遗迹

抗日阵亡将士墓及碑铭 刘伟顺 (304)

邵阳市道教主要官观殿庙 王振奇 (308)

民间风俗

庆鼓坛 刘志阶 (317)

读者与编者

喜读《邵阳历史钩沉》 刘泱泱 (336)

致马少侨先生的一封信 周清澍 (339)

《山高水长》受到赞誉 曾毓成 (343)

筚路蓝缕探道崎 立学传世志弥坚

——纪念吕振羽同志诞辰 100 周年

桂遵义

吕振羽（1900. 1—1980. 7），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吕振羽青少年时代，受辛亥革命和“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走向追求民主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1926年大学毕业后，即投身北伐战争。1928年来到北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他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2月，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一书，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奉行的对日妥协政策。为了清理社会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质和社会史论战中那些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奇谈怪论，为了捍卫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他着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继撰写和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专著。前著重点论证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原始社会的历史阶段，后著论证殷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西周是早期封建领主制社会。

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先后奉调至重庆、苏北，后到延安，主要在思想理论战线工作。为批驳日本反动文人秋泽修二在《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中歪曲中国历史的谬论，吕振羽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等文章。为批驳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吕振羽撰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同时，他又开始编写《简明中国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军进入东北，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开展民族史研究，于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开展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在1953—1963年间，陆续发表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他的有关民族史和民族理论研究的论著，对于纠正大汉族主义、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对于制订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都起到了一定影响。“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迫害，在狱中写了数十万

字的史学评论和咏史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四人帮”粉碎后，他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期间，仍非常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

吕振羽的一生，是勤奋耕耘、顽强拼搏的战斗一生。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为民族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作为一名学者，他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

吕振羽一生撰写和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简明中国通史》等十多部传世名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史学遗产。

从历史学发展的眼光看，他的史学成就和贡献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其开创的殷代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思想体系。这一学说思想体系始创于30年代初，经过40—50年代修正发展，到60年代日趋完善。他在30年代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其学说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吕振羽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如下连续的历史发展阶段：传说中之“尧舜”时代为中国历史由母系本位转入父系本位的时代，殷代为奴隶社会时代，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秦至鸦片战争前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标志着他的学说思想体系已初步形成。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到他的《通史》出版和修订再版时，其学说思想体

系才得以充实和完善。《通史》是吕振羽于1940—1948年完成的一部巨著，新中国成立后曾进行多次修订再版，前后历时20多年，是他一生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学说思想体系的集中展现。《通史》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在编纂指导思想和体例上，《通史》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打破了传统旧史学的王朝体系和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例，将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连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其学说思想体系在自己研究成果和吸收学术界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新的内容，修正前期的偏误，使其更具科学性。关于原始社会的历史，他30年代的论著只是勾画从原始群团进入氏族社会的基本线索和面貌，《通史》中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论述则有了进一步发展。它将远古至夏未定为原始社会时期：神话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为原始社会早期，社会组织为原始群团；“伏羲氏”和“尧舜禹禅让”，反映原始社会后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夏禹传子”，“便开始由母系本位向父系本位转移”。上述论证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殷周时代的社会性质，他在30年代初首次断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而《通史》又作了进一步论证，强调夏商之际中国社会曾发生一次突变，即“成汤革命”，从而产生国家，确立了财产私有制。认为中国历史到殷末已走完奴隶制社会的历程，“武王革命”，“完成封建主义的社会转变”。这些论断，不仅在史学领域，而且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了好几代学人。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吕振羽学说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30年代初，他曾提出在清代前期“资本主义的因素业已开始在孕育”。之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他认定中国在明清之际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缺乏有力的史料证明。《通史》着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兴起和市民阶级斗争等方面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明末首先在纺织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清代乾嘉年间又较明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清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和闭关政策，“阻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和发展的进程”。他又进一步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幼芽，又被列强侵略炮火烧毁了”。因此，“重新形成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列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始终是软弱的，带有两面性的，无力和没能力去完成其历史任务”。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特点的分析，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后来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这一科学的分析，为他的学说思想体系中确认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封建制复兴到崩溃”时期，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依据。

综上所述，吕振羽的学说思想体系，是他长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而形成的科学体系，成一家之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

除了诸多史学成果之外，吕振羽还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的治学道路、开拓创新精神和严谨

的科学态度。

他的治学道路，是从革命需要走向史学研究的。因此，他始终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始终坚持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为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他从本世纪 20 年代末步入学林，就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南，是历史科学的灵魂”。同时，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不等于不重视史料，指出“研究历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要空洞地给历史下结论。他特别提出，研究历史要反对“历史公式主义”，因为，公式主义者“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南，而是任意裁割史料，或只罗列一些个别历史事例去填充他的现成的公式”。因此，他研究历史始终坚持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史”和“论”相统一的原则。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风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吕振羽具有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集革命者与学者于一身的崇高品格。这一品格，集中体现在他的治学道路不是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的道路，而是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如上文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由此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他此时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正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相结合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深入开展民族问题和民族史研究，通过做学术报告和撰写论文等形式，教育各族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未来使命，从而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

这也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相结合的。他立足现实，坚持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吕振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原始社会史、殷周史、思想史、民族史等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创新。如殷周以前的原始社会史，当时学术思想界受疑古之风的影响，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传说历史是虚构的，是子虚乌有。因此，殷代以前的远古历史，几乎无人问津。而吕振羽以“筚路蓝缕探道崎”的开拓创新精神，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中有关原理，结合中国古籍中神话传说的记载和考古发掘的仰韶各期古物，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进行了整理，拨开了疑古派的迷雾。吕振羽的开拓创新精神，动力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来自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来自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对人民大众的赤诚之心。正是这些力量，激励着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敢于向旧的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挑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我们学习吕振羽，不仅要学习他对某些具体历史研究的创新成就，更主要的是要学习他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吕振羽的严谨的科学态度更令人尊敬。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殷代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的创始人。但他从不固步自封，在历史研究中，重视文化遗产，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并不断从中吸收科学的内容，丰富自己的学说思想。他尊重历史事实，对自己旧著，“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材料缺乏的限制”而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不掩饰，而

是通过修订再版、进行充实和修正。如原始社会史，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大量地下发掘的丰富资料，他在修订再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时，新增加了《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等文章作为《补编》。他从无门户之见，对同时代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非常尊重，与他们互相探讨，共同建设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一高尚史德，是值得提倡的。

吕振羽已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贡献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当 21 世纪来临之际，我们应像吕振羽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不断创新，奋发前进，努力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吕振羽的最好纪念。

（原载《求实》杂志 2000 年第 2 期）

孙中山与袁也烈

何锦洲

为培训军政人才，1924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袁也烈，又名袁炎烈、袁振武，1899年生于湖南武冈（今洞口）。青年时代在故乡读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课余时间，喜读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和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刊《中国青年》，追求进步。他曾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长沙市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均获优良成绩。1924年7月，他到广州，考进桂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转到黄埔军校第二期，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股干事，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股主任黄鳌领导下工作，（参见《黄埔军校史料》第50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11月3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兼黄埔军校总理、大元帅府大元帅、曾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到黄埔军校作辞别讲话，大意说：最近，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电邀我到北京谈判国家大事。我决定北上，现谈谈北上目的。“从前革命都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效力方大。”认为到北京，可借这个机会，多